

新闻 研究 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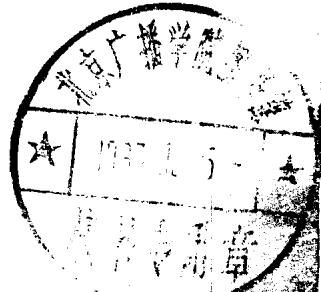
- 胡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领导 邢方群
纪念盐阜大众报创刊四十周年 王阑西等
关于新华日报 韩辛茹等
我国企业报史考略 马学斌
《延安归来》与拒检运动 尚 丁

新闻研究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一九八三年九月



新闻研究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张印 180.000字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190·016 定价： 0.80元

目 录

纪念《中国青年》创刊六十周年

- 胡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领导 邢方群 (3)
《中国青年》明确办刊思想前后 徐江明 丁磬石 (12)

盐阜报史资料

- 刘少奇同志为盐阜大众创刊十五周年题词 (23)
纪念盐阜大众报创刊四十周年 本刊编辑部 (24)
胡乔木同志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 胡扬、方铭口述 曹晋杰整理 (26)
张爱萍同志为盐阜大众报创刊四十周年题词 (28)
回忆抗战时期盐阜地区的新闻工作 王闻西 (29)
光辉的历程 唐辛柏执笔整理 (32)

关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方面军”

-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作用 韩辛茹 (52)
重庆新华日报初期片断 鄢中铁 (63)
徐光霄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论战 王美芝 (66)

新闻界人物

- 忆袁毓明同志 仲 仁 (72)

新闻战士的战斗生活

- 访纪希晨 彭正普 (80)

广播史料

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 赵玉明 (97)

- 延安(陕北)台的《对国民党军广播》 郭镇之 (103)

报刊史料

- 重庆新民报的延安通讯 陈理源 (117)

- 《延安归来》与拒检运动 尚丁 (124)

- 战争年代的战友报 贾德昌 (133)

- 回忆我在广西日报 张洁 (140)

- 商务日报的回忆 熊明宣 (161)

我国企业报史考略

- 解放前的企业报 马学斌 (167)

- 广益丛报和重庆日报简介 朱苏 (200)

- 解放战争时期新闻出版界的反抗斗争 王文彬 (211)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 (十三)

- 方汉奇 谷长岭 冯迈 (229)

- 小主人报呱呱坠地 (252)

纪念《中国青年》创刊六十周年

前　　言

《中国青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刊物。今年10月20日是这个刊物的创刊六十周年纪念。

《中国青年》是在1923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发刊的。它最早的主编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青年运动早期的领导者恽代英同志。革命先烈肖楚女常参加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也常为它撰稿。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任弼时同志从1927年起担任团中央书记后，也领导过《中国青年》的工作。大革命失败，《中国青年》被迫停刊，恽代英、肖楚女同志和刊物的后任主编李求实同志，还有好些撰稿人，都先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可以说，《中国青年》是凝结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的。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领导这个刊物工作的，主要是当时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半月出一期，共出版了二十九期。后因皖南事变发生，战争环境发行困难而停刊。

1948年12月，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又决定出版《中国青年》，把它的复刊作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重要步骤。建国以来的《中国青年》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发行量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却受到猛烈地冲击而再度被迫停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9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青年》才又得以复刊。

为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六十周年，一些在中国青年杂志社长期工作过的同志，决定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分头撰写文章，回忆1948年到“文革”前的《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在这个专栏里陆续刊载。

胡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领导

邢 方 群

胡耀邦同志在1952年来青年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他一到来，就十分重视青年报刊工作。他主持的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常常讨论团的思想工作和报刊宣传工作。从1953年秋天起，他在每个星期日晚上，召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宣传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到他的家里开会。会上往往由他传达中央的一些重要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随后就结合团的工作，发表议论，研究青年团应该如何根据中央的精神，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边谈边出题目，叫青年报刊作文章，组织报道。我们每次参加会议之后，脑子里装满了新的精神，身上又肩负着耀邦同志交给的宣传任务。耀邦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期，经常仔细看《中国青年》，他还一些文章上，用红笔圈点点，划道道。他多次对《中国青年》的工作，给予指示。从1952年直到1964年他离开北京到西安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十多年中，《中国青年》的宣传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同他的领导有密切关系。而这个时期《中国青年》发生的一些缺点，例如，有时跟中央的精神不紧，抓思潮不敏锐，有些文章水平不高，对新生力量写的文章刊登的较少……则是由于我们编辑人员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作为这个时期《中国青年》的总编辑，负有更大的责任，至今回忆起来，犹感不安。

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多次讲话，我都作了记录，有

的还收集在印出的关于改进杂志工作的一本小册子里。可惜，在十年内乱中，我的笔记大部分丢失了，现在只能根据已找到的材料，加以归纳整理。从初步整理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到，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所作的指示，是十分深刻的，不仅对当时的刊物编辑工作有重大意义，对今天刊物的编辑工作，同样有现实意义。

要明确《中国青年》的性质

耀邦同志多次强调，《中国青年》并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根据当前运动，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谈思想。不是个别青年的思想修养问题，也不是某一个部门、某一个时期的偏向，当然，这也是思想问题，但我们不只限于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我们要搞更多人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搞那个时期的思潮问题。”他在另一个场合又向我们指出：“《中国青年》杂志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青年》与其它杂志相比，有它的特点和任务。《学习》杂志是个理论、政策的教育刊物，应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文艺报》是宣传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刊物，就应该成为文艺政策和文艺理论的权威……而《中国青年》是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综合性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我们杂志从来就是有这个历史特色的，不过有时这个特色表现得鲜明一些，有时表现得黯淡一些罢了。”他强调，刊物的思想性要比报纸的思想性来得有系统，说理性也强一些。他说：“刊物一定要结合当前政治生活、群众生活中的大事，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青年的思想。青年最关心的是世界往何处

去，中国往何处去，自己往何处去。因此我们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配合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就是说，要抓时代的思潮……在刊物文章中，如果没有问题，不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传就是教条主义。”

耀邦同志主张《中国青年》宣传现代科学技术，每期刊物上要有一两篇文章。他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在这方面教育青年是我们的历史任务。这是当前与今后在国际阶级斗争中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要极大地增长自己的勇气，不能因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少知或无知而冷淡。人的能动性、人的意志，也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现在，敌人讥笑我们不行，但我们决不动摇。我们在这方面要提起青年的极大兴趣、愿望与决心。

耀邦同志也赞成刊物指导青年的生活。他曾对我们说，提倡青年晚婚问题应大搞一下，尊敬父母的问题也可以搞。《中国青年》曾转载一篇从苏联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吸烟的害处》，文章说明，每支烟里有多少尼古丁，人们每天吸多少支烟，实际上吸进了相应数量的尼古丁，而这些尼古丁日积月累起来，对人的身体极有害处。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全国纸烟的销售额为之下降。耀邦同志称赞了这篇文章。《中国青年》还转载过一篇苏联刊物上的文章《审判后的谈话》，文章讲一个老学者和他的夫人溺爱儿子，儿子堕落了，走上犯罪的道路，被法院判了刑。老学者后悔不迭，对记者讲了自己的痛苦教训。这个故事给我们国家的一些干部特别是较高级的干部敲了警钟。我们有些干部在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对子女娇生惯养，要求不严，有的干部子女就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以至腐化的

恶习。耀邦同志把这篇文章连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一篇通讯以及其它有关文章，送给了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嘱把这几篇文章印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干部，作为鉴戒。《中国青年》还登载过一首短诗，题目是《幸福像孔雀一样飞来》。耀邦同志看后，对我们说，幸福要靠青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去争取，哪能不费一点力气，幸福就会从天上飞来？要教育青年用自己的艰苦劳动，去创造祖国人民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要使青年们幻想在家里闲坐着就会得到幸福。

要求刊物提高质量

耀邦同志一向主张《中国青年》要提高质量。1956年11月20日，耀邦同志召集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有关编委，共同研究《中国青年》的工作问题。耀邦同志在听了大家谈的情况和问题之后，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总结杂志过去的经验教训，我想，首先应该要求每期刊物都要有两三篇非常切合当前广大青年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的文章，这好比是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1960年1月7日，耀邦同志对我们讲：“《中国青年》每期要有一篇挂帅文章，立大志，力争上游。文章要做到：不看，感到可惜。这样的文章要提到书记处的办公会议上讨论。文章可上可不上的，坚决不上。当然，杂志还得定期出。要加强理论性、指导性，使人不能不看。这类的文章不一定都是负责同志写，还可找青年写。要把最近十年的《中国青年》，看看，究竟有哪些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为什么能如此？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

为了提高质量，耀邦同志主张抓住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他批评《中国青年》在1956年下半年在好几个问题上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如：没有深刻谈谈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也宣传得不够有力，波匈时局、二中全会都没有及时配合上。在1956年年底，他向我们提出把当时的大问题抓一下。他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与群众同甘共苦问题要好好谈谈；配合整风，把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好好加以解释；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加一个副题《目前时事宣传的基本提纲》，把青年对时局的重大思想问题都谈一谈，并提供新材料。登了出去，青年一定愿意看。”关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他主张写一篇《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他说，一看这标题，就能吸引住人。他还说：“你们每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这就得好好设计，看应该抓哪些大问题。”他称赞《中国青年》在前一个时期的宣传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显得最突出的，一是总路线，二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三是肃反，四是新生力量的问题。1962年，《中国青年》编辑部几个同志，曾就青年提出的有关天才方面的一些问题，去请教郭沫若同志。郭老谈了许多对青年极有教益的意见，编辑部把他的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经郭老修改，以《天才与勤奋》为题在刊物的第十二期发表。耀邦同志看了，大为赞赏，嘱我们继续收集青年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再请郭老写第二篇。

耀邦同志在强调刊物要针对思潮写些有分量的文章的同时，也主张要有一些轻松活泼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青年愿意看轻松的东西，这方面不能不有，目前刊物不够活泼，活泼轻松的东西应多一些。刊物可分两部分，上一部，下一部。”

他又说：“关于生动活泼的问题，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考虑，生动活泼务必与思想指导、战斗性相结合。”

要注意发表青年写的稿件

关于作者，耀邦同志说，首先刊物应该团结一些骨干作者，使他们能够帮助刊物写些好文章。另外，也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青年中有好文章，也一定要登。

1960年，耀邦同志从一个会议的材料中选出两篇发言稿，交给了《中国青年》编辑部，并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江南鲜花塞北开》，作者罗荣，原是四川江津县人，1957年与一个解放军干部结婚，1958年到婆家河北省隆化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当了会计，她讲自己参加劳动后思想上取得的进步和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另一篇是《我在农村安了家》，作者王培珍，讲她从天津市女七中毕业后，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公社当社员经受锻炼的经过。耀邦同志在信中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很好，真是文情并茂，一口气可以读完。”他还说：“许久以来，我是极力主张我们的报刊适当地但又必须是认真地登载一些来自群众的稿件，特别是来自先进分子群众中那种自传性质的通讯、特写、发言和论文的稿件。我始终认为，这样的稿子对青年，对我们自己，都是极好的教材。”耀邦同志还概括了群众优秀稿件的五个特点和作用：1、充满生活气息，最能鼓舞人们热爱生活，丰富和坚定人们的革命人生观。2、充满着一般教科书和一般文艺作品所找不到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知识，这些实际知识，对帮助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认识世界有很大作用。3、不但有内容，文字上一般也简明朴实，不空空洞洞，不哼哼哈哈，不拖泥带水，

有些语言也非常深刻。这对锻炼知识青年、干部的能力（即思想表达能力），反对党八股、学生腔也能起很好的作用。4、有计划地刊载这样的稿子，不但可以有力地鼓舞广大青年努力向先进分子学习，鼓舞先进分子努力保持先进，而且可以鼓舞成千成万的普通劳动者的写作勇气。5、有计划地刊载这些稿子，还可以使我们自己更好地联系群众，熟悉群众的斗争、生活、语言和思想感情。我们得不断地努力从联系群众中学好群众观点，用“从群众中来”的办法，丰富我们办报办刊物的群众路线。

耀邦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着重强调报刊都要好好发表来自群众的东西。他叫我们检查一下，过去把群众的好东西扔掉没有。他说，你扔掉，他就不写了，写了也不送给你了。你提倡，他就更起劲，还会带动更多的人加劲。这样我们刊物又起了造就青年作者的作用。应该造就更多的作者，这是一件更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要改进文风

耀邦同志很注意文风。他向我们指出：论文一定要切合青年的实际。一是青年，一是实际。不是抛开青年写其它的政治思想论文，也不是不问青年中存在着什么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乱写一通。我们过去有些时候遇上一件较大的事情，或者逢年过节，不管有没有必要，照例要写篇社论或一篇大论文，因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究竟青年需要不需要出发，只是为了表态，为了应景，就只好硬凑。硬凑当然写不好，白白花费气力。切合青年实际的政治思想问题很多，这方面是写不完的，但是要写好，要有认真的调查研究，要有认真的写作态度。

他对文章的通俗化，讲了很精辟的见解。他说：“究竟什么是通俗化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现在我们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却有两个极端，认为要理论化，就得堆积一大堆概念，生造一大批离奇古怪的词汇；认为要通俗化，就把群众现在还不熟悉的马列主义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概念一律砍掉，把普通的一句话当做三句话、四句话来说。这两种极端怎么能叫理论化和通俗化呢？应该说这叫做庸俗化、低级化。一个能够说出深刻的理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用通俗形式表达的人。”他还说，我们的一些论文，应该掺合一些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来写，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话去吓人。

对编辑人员的亲切教导

耀邦同志不仅关怀《中国青年》杂志，而且同样关怀杂志社的编辑人员。他对杂志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每当《中国青年》编辑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总是为我们鼓劲，肯定杂志办得是有成绩的，路线一直是正确的。他说：“现在谈改进，是因为面临着新的情况而需要改进，这就要参照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把杂志提高一步。”他向我们指出，思想上不要怕改，今年上半年要改，下半年也要改，要不断地改。他告诫我们不要骄傲，要继续前进，就要虚心，就要学习，就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长处，来充实自己。他强调指出，不怕改进的人和不怕改进的党，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他要求杂志社的同志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精通一门学问。要在编辑部内提倡良好的学风，要经常了解研究党的政策，对政治理论和政策要有兴趣。他指

示我们要同生活联系，同实际联系。他说，人能生存就是因为他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同自然界隔绝了，就要死亡，就无生命；如果同社会隔绝了，就要在政治上死亡。同自然界、同社会生活隔绝，这是违背自然规律，违反马列主义根本原理的。所以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决不要把自己从社会中孤立起来。他要求我们多搞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是做青年工作的人，我们就要接触青年，了解他们的心理，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抓住他们在想些什么，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他还说：“人们的心情和想法并不是每天都从嘴巴里讲出来，并不是都见之于行动，要靠我们去琢磨和了解。”

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青年》杂志兴旺发达的时期，也是杂志社的同志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受到教育和锻炼较大的时期。之后，中国青年社的一些年龄较大的编辑人员，先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常常怀念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那样的注意思想工作，重视报刊工作。他们不忘耀邦同志的谆谆教导，继承和发扬团中央的优良作风，在新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事业生气勃勃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青年》明确办刊思想前后

徐江明 丁磬石

正如许多老一辈同志对大革命时期和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感到十分亲切一样，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中年干部、知识分子一提到《中国青年》，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在青年时代曾深受这个刊物的良好思想影响。建国后的《中国青年》之所以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为青年所喜爱，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继承发扬刊物的光荣战斗传统；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给它规定的编辑方针。

1948年，党中央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写道：“为了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学习，中央决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中国青年》定期刊物。”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组织广大青年学习，这就是党中央给《中国青年》规定的方针任务。但对这个方针任务应如何正确理解，如何具体贯彻，也就是说，应该明确哪些办刊指导思想，中国青年编辑部则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摸索过程的。这主要表现在以哪些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如何结合实际指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团的工作这几个问题上。

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

任何刊物要办好，都需要首先明确读者对象。只有明确读者对象，宣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党中央给《中国青年》规定的任务是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